

中共党史 学习与参考资料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册)

教学用书 请勿外传

曲阜师院政史系中共党史教研室编

一九七七年六月

目 录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1927.8.7)	1
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 (1928.7.4)	34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政治议决案(1928.7.9)	37
土地法(1928.12 在井冈山)	65
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1929.1)	68
红军第四军军党部布告(1929)	70
土地法(1929.4 在兴国)	73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1929.10.15)	75
中央第九十六号通告(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号召全党1930.12.22)	85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1931.1.27)	89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1933.1.17)	93
关于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48.5.25)	95
怎样分析阶级	95
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	96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为中国工农红军北
上抗日宣言 (1934.7.15)	114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遵 义会议1935.1.8 政治局会议通过)	118
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1935.8.5 中央政治局通过, 毛儿盖会议)	136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1935.12.25中央政治局通过, 瓦窑堡会议)	148
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1936.9.1)	170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 (1936.12.19)	172
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 (1936.12.19)	173
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 (1937.2.10)	176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 (1937.3.31)	178
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1938.4.18)	182
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 (1938.4.19)	183
* * *	
回顾长征	刘伯承 189
* * *	
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 (1927.11)	202
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 (1927.11.21)	瞿秋白 221
中国革命低落吗? (1928.2.20)	瞿秋白 226

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摘录）（1930.5.15）	
.....	李立三 230
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1930.6.11	
政治局会议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	234
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1930.12）.....	250
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1931.1）	
.....	罗章龙 258
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节录）	
（1931.2）.....	王 明 268
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1932.1.9）.....	273
中共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34.1.18）.....	284
多余的话（1935.3）.....	瞿秋白 305
张国焘声明（1938.4.22）.....	330
张国焘敬告国人书——并与中共同人商榷抗战建	
国诸问题（1938.5.6）.....	331
论短促突击（1934.6.17）.....	林 彪 338

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鉴：

一、绪 言

同志们！

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现在致书于全体同志的时候，正是很困难危险的时期——伟大的中国革命遇到了极艰巨的磨折。今年四月间蒋介石在上海发端的反革命政策，如今在武汉政府领域之内继续发展而完成。三个月以前，武汉政府曾经宣布，蒋介石是革命叛徒，现在呢？它自己学了蒋介石的榜样反革命，如今冒国民党之名，甚至于冒“左派”国民党之名，来摧残工农运动，在武汉领域之内与蒋介石之治下是一样的；他们所用的方法也是差不多的，农民协会被解散、被禁止，几百几千的工农运动的指导同志被武汉政府的将领所残杀，农民运动所及的区域，无不受反革命的清乡所蹂躏；工人亦是到处受摧残。他们的武装被解除，他们的工会日益受着压迫或占领，他们的指导者亦被残杀，工会机关之中到处遇见军阀豪绅指派来的走狗。压迫得尤其严重的，便是我们的党。一切反革命势力联合起来，反对共产党——从反动军阀一直到被革命所吓慌的小资产阶级。然而现在他们不称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蒋介石所领导

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为人民之公敌，却称共产党为 人 民 之公敌。国民党现在的领袖汪精卫等，卑劣无耻的背叛了国民党的主义及传统，接受军阀的命令而与共产党破裂。国民党驱逐军队中的共产党党员，我们的党不得不秘密起来；因为反动派要想完全消灭我们。反革命暂时的得着了胜利，正拿着武装来对付劳动阶级。如果现在所有的工会还没有捣毁净尽，如果工农运动的指导者还没有完全被杀，如果政府还在宣言保全工会团体，那末，这不过是因为反革命的军阀和国民党的领袖还没有完全集中团聚自己的力量。

我们要知道，如果群众运动不能够起来坚决的反抗，最近期间白色恐怖决不会减弱，只有越发厉害。我们对于国民政府的“尊重”工农，没有丝毫的幻想！这所谓国民政府是什么？它从革命的政权机关变成了资产阶级之反动的执行机关，变成了军阀的工具。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如汪精卫之类，见着革命发展便吓慌了，宁可背叛国民党的主义，完全走进资产阶级的反动营垒。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对于资产阶级的反动派，现时还有些用处；因为革命运动的力量没有完全镇压下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利用国民党的这些叛徒，好暂时冒着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招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其实已经背叛了，出卖了革命的国民党之光荣的旗帜。

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汪精卫、孙科等大多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既已走到反动方面去，自然不是国民党的代表和领袖。所以一切工人农民都应当知道，最近期间的白色恐怖，要在汪精卫叛徒的旗帜之下而实行，而且要一天天的厉害起来，只有广大的劳动群众积极起来反抗，实行革命的斗争，才能夺去篡窃国民党旗帜以实行白色恐怖的叛徒之武器，而扑灭反革命。

现在的形势是反革命派屠杀工农群众，压迫群众运动，捣乱工农团体；所以中央委员会首先要告诉你们的，便是你们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中国共产党从群众运动里发展成了伟大的力量，在革命斗争的时期，它的作用是绝对的伟大的现在，我们的党作用更加要大了。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中国问题的历次决议，都说党的政策及党的指导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过去中国革命的进程，大半与本党政策有关系的。将来革命的命运在形势变更之后，更加要靠我们党的政策正确，要看我们党对于形势变更之后的职务之履行如何而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最近决议指出，我们党的指挥犯了极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全党积极的自己批评这些错误而纠正它们。这些错误并不是指各个的偶然的错误而说的，而是说党的指导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如果不抛弃这一机会主义的方针，纠正过去的错误，那就不能正确的规定将来的工作，自然更不能进行革命的斗争，以适应当前的艰巨职任。要纠正错误的方针，必须指明是怎样错误的，应当要使每个党员都得着过去的教训；我们党如果不纠正指导机关的错误，那就一步也不能向革命的道路前进。工人阶级的革命党，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只有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要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怕公开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共产主义者不能无所畏惧无所忌讳的批评党的错误、疏忽和缺点，那么，共产主义也就完了。我们的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我们深信本党的生命与力量决不致于怕披露和批评我们的疏忽和缺点，甚至于披露之于我们阶级仇敌之前也无所怕。等共产党的敌人幸灾乐祸好

了！让他们去乱叫共产党崩坏好了！这种攻击，是吓不了我们的，我们胜过敌人的地方，正在于我们是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之先锋队，能够在自己错误经验里学习出来，绝无畏惧披露自己的错误，并且有力量来坚决的纠正。

我们党有这种伟大的力量，不但因为我们党的阶级性使然，而且因为有群众的奋斗，无产阶级及贫苦农民群众之奋斗做保证——这些群众是我们党的基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上说：“中国共产党英勇的奋斗，中国共产党广大的党员群众，艰苦牺牲的在社会下层工农城市贫民之中，实行真正革命的奋斗”。我们党的指导机关却有机会主义的错误，经常的动摇和犹豫，在紧急关头总是没有坚决行动的决心，指导机关的非共产主义的不革命的理论以及不革命的行动，不但绝对的与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相矛盾，并且和我们党员群众工作相反。

譬如说：上海、广东、湖南本党普通党员群众都有过伟大的奋斗，屡次光荣的总同盟罢工，上海三次工人暴动——最后今年三月的一次得着了胜利，这些都是光荣的历史，不但在中国史上有无上的光荣，而且在世界革命运动史上也是如此。这一页光荣的历史，是上海共产党——无产阶级所写的。

上海无产阶级在共产党指导之下所表现出来的勇敢性，革命性，阶级意识的坚决和政治意识的高度，甚至欧洲各国无产阶级所不能超越的——那些国里的工人革命运动，差不多都有了几十百年的历史呢。中国共产党可以以上海的共产党群众自豪了；上海工人在蒋介石屠杀之后，虽然受着闻所未闻的压迫，许多最好的指导者（如陈延年，赵世炎及其他同志）被杀，一切运动都压迫到非常秘密的地位，然而仍旧继续着斗争，表现不可摧残的伟大力量。广东的共产党员，领导了铁路工人的暴动以反抗李济琛，领导农民运动的武装暴动能够在各

地方继续抗争至两月之久，真正象勇敢坚决牺牲的革命党人，奋斗到最后一滴一点的可能，这些共产党员真正可以做革命形势中工人阶级的先锋的榜样。湖南同志领导农民运动的斗争，亦是这样光荣的中国历史里的一页，农民协会的实际的政权，是共产党员领导而农民群众所创造的；自动没收大地主土地，分配土地于乡村农民，解除豪绅团防的武装，创立武装的农民军，严厉的镇压封建的反动分子，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规模，而且会和国民党下级群众结合革命的联盟——而不是机会主义的联盟——最后组织农民暴动，以反抗长沙的反动政权（这次暴动如果不是中央党部机关在紧急关头采取可耻的退让政策，无疑的是胜利的。）——这都是湖南共产党员努力的成绩。这是解决土地问题最好的方法。其他各省的共产党员群众，亦是如此。党员群众的行动，真正是英勇彻底的革命斗争，这种斗争要忍受很大的牺牲，但是我们党的群众没有怕牺牲的。中国革命之中，他们的奋斗，使得我们的党取得伟大的光荣和信用。党的群众是我们力量之源泉，有他们的帮助，党的指导机关之错误，无论如何大，都是容易纠正的。固然，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动摇犹豫，没有坚决实行的能力，这对于中国民众的革命斗争和共产主义的运动大有损失；然而本党有上海、广东、湖南的经验，决不会因指导机关之错误而陷于败亡。本党一定有这个力量，保证今后有正确的革命的布尔塞维克的指导。

二、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

党的指导有机会主义的错误，其基础在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不了解各种阶级在每一革命阶段里的作用，以及共产党的作用。正确些说：是对于这些问题没有布尔塞维克的马克

思主义的了解。党的指导每当解决这些革命之根本问题的时候，时常在理论上实践上违背共产国际的根本原则及列宁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估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些根本问题上陷于最庸俗的机会主义。

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而有生长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趋势。中国革命尚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它反对帝国主义之压迫及封建制度之一切社会经济政治的遗毒。现在中国革命的根本内容是土地革命，是工人阶级要求解除闻所未闻的压迫制度与奴隶制度之斗争；这种奴隶制度，正是帝国主义依据中国封建关系以建立其统治之基础。

如果以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及社会革命相对立，那末，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简直不是布尔塞维克的。共产国际向来反对这一般的观点，认为是最坏的一种机会主义。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案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决的反对以国民革命的职任与阶级斗争的职任相对立的观点，这一类的观点在西欧各国的极左派与社会民主派之中都有的，其实这是抛弃中国民权革命中无产阶级之领导权，抛弃领导权而争所谓‘劳工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是机会主义之一种，实际上便使无产阶级变成‘民主营垒’的尾巴。”中国革命中各种社会阶级的作用是怎样的呢？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极大部分是依据中国经济的落后，依据于农村中的封建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关系及政治制度中的封建制度遗毒，是外国资本无限制剥削中国民众之最好的依据。帝国主义维持着地主豪绅及封建式的行政机关。封建阶级维持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所以非常之明显的是：反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同时就在以全力反对地主豪绅的政权。封建制度的破坏，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上严重的致命的打

击。而要破坏这一封建制度，又只有用剧烈的土地革命，愈坚决愈剧烈，农民群众加入斗争的愈多，歼灭地主豪绅的统治愈厉害——则国民运动的规模愈广大，国民运动的胜利愈巩固。

从另一方面观察，外国资本在经济上勾结一部分城市资产阶级（买办），这一部分资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保存而扩大。

至于所谓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呢？那么，他们是受外国资本的竞争而又受其排挤的一部分中国资本。因此，他们被逼而不得不对于帝国主义实行经济斗争。

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曾经参加中国的革命，甚至有一时期曾经做这一运动的领袖；然而迅速发展的工人阶级及农民群众运动，提出革命的阶级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又大大的发展，这些情形，使民族资产阶级离开国民革命的战线而走入反革命的营垒。民族资产阶级这种政策上的变节，以蒋介石在上海的屠杀而著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今年四月间，饱受革命运动伟大的规模之恐吓，就要去和帝国主义妥协，他如今和买办阶级，封建阶级的大地主相象，将要成为外国资本对于中国统治之支柱。正因为这种情形，更使无产阶级的斗争——力争自己真正的阶级要求的斗争，变成民族解放革命所必须的条件。

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免的使它与帝国主义接触而引起最坚决的冲突，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足以掘断帝国主义力量之根源。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程度之低，真是闻所未闻，这种情形，保证了外国资本在中国取得了最高的利润，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正可以掘断帝国主义压迫所依据的支柱。中国工人阶级则因客观状况的关系，是力争中国民族解放最坚决、最彻底、最不妥协的阶级，此种情形，使中国

无产阶级应得民族解放运动中之领导权。可是中国无产阶级要履行自己解放中国民族的使命，只有随着力争自己的阶级要求的斗争的发展，就是反对外国资本及中国资产阶级斗争的开展，而日益实现这个使命。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决议案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承认中国的民族解放革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已经‘完了’，仿佛在上海屠杀之后，已经开始了别一种工农的阶级革命——这是不对的。”中国革命现时的危机及各种社会阶级力量离合现势，表明并且证明，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完成（土地革命亦在其内），尤其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完成，必须实现于反对已成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之斗争之中。彻底的民族解放斗争，不但不会和工农群众的斗争开展或土地革命的要求相冲突，而且能直接发展广大的下层民众的群众运动。

谁要民众解放革命得到胜利，谁要中国完全脱离外国的压迫，他便应当促进、扩大并激励工人反对资产阶级，农民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他便应当赞助社会斗争，使之进于全体平民革命之新方式。

至于小资产阶级，则除去少数的反动的成份，与买办阶级、封建阶级相勾结的成份，其余一般手工业者、商人、学生、店员及城市贫民，亦因自己客观状况的关系都利于革命的阶级运动之胜利。然而小资产阶级必然是动摇、犹豫徘徊于互相斗争的阶级及革命反革命之间。这种犹豫与动摇，往往对于革命斗争的出路，有举足轻重的力量。

但是小资产阶级动摇犹豫的态度，大部分由于革命阶级运动的力量决定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斗争愈坚决愈剧烈，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愈深入，则小资产阶级愈能转向左倾，愈能

站到革命的战线上来；反之，如革命的阶级及共产党自己也表现动摇，不彻底、不坚定，则小资产阶级愈加倾向资产阶级的营垒，反革命的营垒。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除自己的坚定与果决外，没有更真实的领导小资产阶级的方法。

列宁屡次的说过：“谁要帮助动摇犹豫的人，必先自己开始便应当不动摇不犹豫”。我们是应当记着，社会之中既然发生了两大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小资产阶级便无论如何不能有自己的策略；他或者和资产阶级同道，或者和无产阶级同道，无产阶级应当明了小资产阶级之动摇是不可避免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自己应当有坚决的政策，去以革命的方法解决目前的问题。

凡此一切，都是对于中国革命中各种动力的估量，足以决定共产党的革命策略的。然而我们党的指导，在理论上，尤其是在实际上，刚刚对于中国革命中各阶级的力量的估量，有一个相反的观点。这就预定党的指导之机会主义动摇犹豫政策。中央完全是孟塞维克派似的，将民族解放运动与阶级斗争相对立，仿佛认为阶级斗争的开展，足以破坏国民革命，而要想叫全党及工人阶级农民都自己来限制阶级的要求，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地主不用革命的斗争方法。中央在六月十九日所发给上海的信，对于上海斗争的指令说：“中国革命主要特性之一，是反帝国主义……现在几乎忽略反帝工作”，仿佛专注意于进攻封建制度，而得不到不好的结果。中央骂共产党员走得太远了，更叫本党所领导的革命的农民往后退，这一指令里又说：“一方面反帝国主义运动消沉下去，别方面工农运动发展到最高限度，至少小资产阶级看来是如此。单调的去武装工农没收土地，高叫非资本主义前途等口号，使小资产阶级怀疑共产党快要革国民党的命，要进行阶级革命而不是国民革命”。这样中央那时

认为阶级斗争是一事，国民革命又是一事。这一信里又说：“小资产阶级看不见没收土地是国民革命的必要前提，以为只有共产党要没收土地，实行十月革命似的革命，以增加工农的力量，因此小资产阶级不能不提出这种问题，不能不要求限制工农运动，甚至于与共产党破裂。在这种情形之下，能不能完全接受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呢？如果这样，那就是取消我们的力量，抛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投降蒋介石，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前途。然而能否硬要没收土地武装工农呢？这个结果就要立刻破裂而消灭革命的根据地。如果我们不能用相当的方法渡过这种难关，那就是资产阶级胜利。我们应不应当抛弃没收土地武装工农的政策呢？这当然不好。譬如湖南反许的问题，我们已经决定领导农民自动的没收土地，武装起来，这是独立的政策。但这种政策太危险了，假使我们完全独立的干起来，那末，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将要破裂。固然这是光荣的失败，但是破裂对于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应当找新的道路。经过新的道路来渡过现在所遇的危机与困难，使革命深入广出，而得到最后的胜利”。这指令的结论是：中央叫上海的党部“不要看着国民革命运动是工人问题”，而要到各阶级中去宣传反帝国主义，这是说去宣传上海资产阶级。这真是闻所未闻的不革命的非共产主义的方针，足见中央指导机关对于革命的根本问题，对于中国民族解放革命的性质问题的见解都是错误的。

中央在这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是共产主义者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反映，整个儿的革命策略，都是本末倒置，中央的这种方针，完全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及决议不符，完全与党员群众工人阶级及革命的农民之斗争不符。

谁要替这个机会主义者辩论，或者主张继续这种机会主义，他便永久和共产主义离别了。

三、中国共产党与工人运动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就是无产阶级最先进、最革命、阶级觉悟最高的一部分。共产党的工作应当永久从工人阶级根本利益出发，要求以革命的方法，变更全社会的组织。共产党既然以工人阶级利益为最重要的前提，同时，再要提出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时期中客观上可以解决的要求，在这一革命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上的时期中，都是如此。共产党主要任务之一，便是组织工人群众而指导他们的斗争，坚决的力争增高生活程度，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争得绝无束缚的工人组织及阶级的工会之完全自由，争得无所限制的罢工权，努力反抗以及消灭工人无权无利的奴隶状况。

这种要求，工人都可以在民权革命中提出，但是必须用无产阶级群众的独立斗争。共产党应当发展、扩大并激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应当领导工人每次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共产国际屡次命令中国共产党，要我们尽力量增进工人阶级群众的物质生活，坚决的要求改良工厂生活，提高工人的社会生活，激急的取消一切压迫工人的法律，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认识自己组织工会及罢工之权利；同时共产国际指示必须迅速勇敢坚决的实行武装工人和农民，尤其是其中最觉悟最有组织的分子。这一政策国际是认为万分必要的，共产国际的这种指示和各地工业区工人群众自己斗争是相符的，和本党党员群众的行动亦是相符合的。然而本党指导机关却是走的别条路，它只在阻止缓和阶级斗争和工人的革命行动，中央不去开展推动罢工运动，却同着国民党领袖规定强制的仲裁办法，而且最终决定主权属于政府。在各的指导者；假使说共产党还没

有完全失掉自己独立的无产阶级的面貌，则是因它的下层组织与党的群众的功劳。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方面、可算尽可能的做到了与国民党“右派”指导完全同化的工作。

在大多数省份中的共产党员，他们的革命工作真正在国民党内达到领导的影响，而中央却反对这些组织。在中央五月通过的关于国民党联席会议的议决案（国民党工作大纲）上说：

“共产党员在联席会议应讨论各种主要的问题，提出具体的建议，但是这些具体的建议不应根据我们党的最大要求，而应注意到民族革命发展的利益与团结国民党的左派”。从这个中央决议中，可以得到的结论是：一，“共产党的最大要求”与民众运动的利益是不一样的，这是两不相容，互相冲突的两方面；二，共产党的“具体建议”不应当建筑在党的“最大要求”，就是说在现在革命阶段上不适用共产党的政纲、策略与一般的政治路线；三，民族革命运动与国民党“左派”，只有在共产党放弃自己“最大要求”的条件下才能发展。共产党对于国民党运动的正确策略之失败，恐莫此为甚吧！

再此决议上又说：“在国民党报馆服务的党员，不当使此等报纸变为共产党的报纸，而照国民党决议的精神去工作”。这岂不是放弃共产党独立政策与政治路线之表示？！岂不是完全服从国民党之指导？！

共产党的这种“服从作用”，它的领袖还正式承认，还以为这是很正确、很适合革命利益的呢！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党团作用（如联席会议之上），实际上已经被党的指导者所完全取消。在某一次国共中央联席会议上，汪精卫说：只有国民党中央有认可与公布通过的决议之权，而共产党领袖陈独秀的回答，竟同意于这种满意，立刻便自动的解除武装，解散汉口工人纠察队。为保存与小资产阶级联盟起见，中央便下命令解散劳动

童子团。

国民党中央下命令叫工人严守革命纪律，还要工会去执行，违法者交政府管理，工会只准处罚工人。我们中央对于这个命令，一句话也没有提出抗议，湖北省总工会接受这等命令，中央亦加以默认。中央对于工人阶级表现的独立性，每次都说是“过火”或“幼稚”，没有注意自己所说的话，实在是反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的话。

党的指导机关的错误策略，不但在工人的经济斗争上是如此，而且关于工人的政治行动，也是如此；武汉工人夺回英租界，是有很大的历史意义的，但是这不但不是经过党的指导机关而实行的，并且中央在事后还说这是不对的。最近中央曾倾向于自动取消上海的秘密工会，而使它们加入蒋介石的黄色工会。对于群众的惧怕，不信任群众的力量——在党内问题里也是如此。党的指导机关里占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经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决的要求之后，方才将几个工人加入指导机关。许多工会之中指导者的党员也不是工人，而是学生、知识分子。当要办党校的时候，中央非常坚决的要使工人分子减少些，说工人文化太低，政治意识不发达、不觉悟；然而事实上，譬如上海的工人，其政治意识比党的指导机关高的多。我们党和这种非无产阶级的、不革命的、透彻的机会主义，必须断绝关系，永不沾染。

四、中国共产党与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共产国际特别说明这一问题不止一次了。这许多时候，共产国际曾经给我们中国党明显清楚的指示，指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